

知识分子向新政权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个侧影（1949-1952）

克里斯汀·韦德尔

里尔第三大学

提要

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失败，与国共两党保持距离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决定了留在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跟处于国共两大政党之间的所谓第三种力量（或称中间势力）有关系。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的第三道路。本文试图从他们的调度来考察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更具体的，我在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决定留在中国？他们在共产党争权前后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怎么过度从1949到1952过渡时期的这几年？

对党外知识分子之选择的解释

这些知识分子们从事不同的专业：教育和研究，法律职业，记者，出版，创作。他们并无参与权力而斗争的癖好，但他们却有自己的立场并且表达了自己与政治统治力量的分歧。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渐渐强调了国家所保障的自由。抗战爆发了以后，他们联合起来，以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并为国家规划一个未来。由不同的小党派组成的中国民主同盟是这样建立的。盟员的目的并不在于夺取政权而在于堵塞统一战线的裂口，并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战争以后，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盟的方案把政治多元和经济公平衔接起来。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就信奉这一理想。

那些呼唤和平与民主的知识分子对国共内战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当国民党彻底失去任何社会阶层的支持的时候，共产党则谋求团结尽可能多的人。为了说服广大的社会群众，中共1948年5月1日宣布蒋会召开一个政治协商会议。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都没有对这个挑战者寄予绝对的信心，但是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局势应该变化，中国应走一条能保障其发展的路。而这个想法让他们把赌注下在共产党这一边，无论这个赌注下得有多么大胆，他们的选择只能用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期待来解释。的确，正因为他们是首当其冲的，所以他们知道任何在国家分裂的状态之下所得来的自治权之局限性。这样的现实确实引领着他们去鼓励国民党政府，以建立一个合法的政府、并使国家现代化。抗战结束后，他们呼吁“另一个”国家却没有成功。最终，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爱国主义和现代化会在共产主义中实现。这样，大多数知识分子作出了爱国的选择，并且他们认为国家的发展乃是当务之急。因此，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愿意做出一定的牺牲。“过程中恐不免有广大牺牲”，沈从文写道，“四十岁以上中年知识分子，于这个过程中或更易毁去……个人悲剧虽多，可不用悲观，社会明日却必然会得到进步……”。

他们这个选择并不意味着他们转变到共产主义者这一边。的确，除了左翼民主同盟的盟员，愿意去香港后来加入北方的共产主义区域的知识分子确实极少。事实上，他们都愿意参与国家建设但他们也都担心，因为他们都知晓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深刻的变化。在 10 月份，由于感觉到会发生变化，在吴晗离开上海到解放区之前，罗隆基、张澜和黄炎培交给了他一封信。信中在以下问题上提出了要求：大会制度、平衡的外交政策、将来民盟从联合政府中退出的权利，还有解决双重党籍问题。11 月份，张东荪宣称，他虽准备做出某些牺牲，但却不会放弃所有自由。其它很多人，比如费孝通，都担心自己职业生活的未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的接管作为一种考验。对中共来说，城市的接管是它从农村发展转型至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关键。不过，虽中共打算利用所有对城市的接管会提供帮助的党外知识分子，但在解军占领北京以后，军管会却等了不少时间才吸收他们参加工作。还无太多经验的中共事实上想要争取党外知识分子但却感觉到自己的能力尚且不够。面对决不能无条件的靠拢它的一些党外人士，中共更小心翼翼的。的确，像张东荪，梁漱溟，张奚若或向达这样的人并不犹豫于表达自己的看法。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中共决心更加努力以说服和争取更多的人并吸收他们参加接管城市的工作。1949 年 5 月，张澜被告知新政权的首要任务将会是“建设”。在 6 月份，章乃器、施复亮和黄炎培最终被允许到上海去，以协助接管工作。中共也设法安抚像竺可桢、储安平这样的教授和新闻记者。党也组织了多次会议，以选派教育、出版、新闻等各部门的政协会议代表。最后，中共宣布自己已度过了接管的考验，但选择了留下来的知识分子还是担心得多。统一战线确实避过了暴力的范围，但忧虑却并未消失。

建国初期党外知识分子对新政府的政策的态度

在建国初期，中共打算进行国家的建设，而且期待与党外力量的合作会有助于此有中共领导而显得特殊的建设。“新中国”将会是党外知识分子所渴求的吗？什么都不确定，但认可《共同纲领》的他们愿意相信它。

政协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的通过，新政府的组建，都代表着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化，也就是说中共和党外力量合作的制度化。这样，党外力量的不少代表者，包括党外知识分子在内，就进入了新政府以参加工作。他们的作用虽有限，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他们的参与看作是他们和中共合作的标志。

张澜、黄炎培、张东荪、张奚若和马寅初这些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五十六个会员当中的会员，张澜就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个副主席之一，黄炎培也成为了轻工业部部长。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或者是因为与党接近，或者是受到信任，或者是专业能力，或者有影响力。同样的选择标准，也体现在省、市一级政府的组建之中，体现在不同级别的政府执掌人员的选择之中，体现在专业或文化协会、商会、小党派等的领导人选的指定之中。

中共的目标是让他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和它所领导的政治秩序。实际上，中共即将发现国家建设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是两个很难同时达成且维持平衡的目标。然而，在建国初期，向社会主义迈进还不在议事日程上。巩固政权要靠巩固党的统治来达到。同时，巩固政权也被视为是通过过渡时期的最好的、唯一的办法；而过渡时期则是更多、更根本变化的前提。的确，中共打算一步步地通过这一过渡时期。因而，许多变革被延缓了，例如高等教育的机构重组被延迟了。官方明确宣布将遵循苏联模式对体制进行渐进的改造，但并不希望过早开始：旧体制仍有某种好处、私营机构仍是需要的。出版事业的重组同样是渐进的。相反的，中共在接管城市的时候就通过注册和重组控制了报刊和媒体，接着发展了新华通讯社和宣传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工作者比其它人承担了更大的压力。

依照同意参与新的政府机构的人士的比例，毫无疑问，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成功的。《共同纲领》提出了中共与其合作者之间的暂时的共同基础。但新的联盟是有弹性的：党外的知识分子们并未受到同等的待遇。虽然加入新政府机构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最受优待的人，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角色。大学教授们的态度同样形成了鲜明的差异。毫无疑问，他们的经历和个性都有一定的决定性。同样，自抗战以来就与共产主义者建立起来的或近或远的联系也很重要。不过，这些关系并不一定担保对未来的信心。的确，当一些党外知识分子获得邀请，得以参与未来的教育政策之准备、并提出建议之际，其它人则被疏远了。王造时就是一例，顾劭刚也是一例。另外，很多人很担心他们的职业前景。《共同纲领》之中有一些涉及教育、学术研究和文化的条目并不能让希望继续使用自己从中国或海外学到的方法的知识分子完全放心。新闻记者、编辑、作家同样感到焦虑。《观察》和《大公报》的继续出版，让储安平和王芸生在一定程度上放心了，但他们却担心是否能够适应新的工作情况。对浦熙修和徐铸成来说，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困难写文章。在面对各个不同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时，这些知识分子所怀的信心各不相同。然而，在大多数时候，希望和恐惧是并存的。

在变动和延续之间：过渡时期的多个侧面

党外知识分子都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在这一方面他们不在平等的基础上。进入了新政府机构的是最受优待的。即使他们不得不学习如何在党的路线和自己的专长之间获得平衡，他们所受的任命还是符合他们的“联合政府”概念。然而，所受的特殊待遇并不总是能弥补他们的挫折和不安。例如罗隆基，他本希望能得到一个部长的职位，此际已然心怀怨忿。此外，他们都不得不宣传党的政策和参加政治运动。他们愿意相信新的中国已经诞生——然而，即使这个良好愿望以及他们的盲目性有助于巩固新的信仰，要不了多久，事实真相仍会使他们大声疾呼。

对于大学教授而言，起初的过渡是相当平顺的。尽管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并未受到同等的对待，但私立学校的重要性使当局不得不保持审慎：匮乏是巨大的，过于仓促的改造会损害 1949 年 12 月所宣告的制度重建。这样，多数人保持着他们的教学工作，那些找工作的人也有选择的自由。他们都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有的也感到自己的不合时宜。另外，高等教育系统的重组带来了

许多疑惧。我们很容易想象被告知不靠史料也能书写历史的史学家们的不安，也很容易想象社会学家们的忧虑。在 1950 年 3 月，为了保护他的专业，费孝通承认社会学应该被马克思主义化，但他强调了社会学对“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有益。然而，自 1951 年，政治教育被强化了。6 月，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宣告了官方的意图是让变动加速。几个月后，思想改造运动发动了且很快与“三反”运动混合在一起。对很多人而言，这个运动意味着某种教育理念的终结，也意味着他们早先所存幻想的破灭。

自一开始，新闻工作者就面临更为困难的处境因为他们很难让自己迅速转变为新政权的宣传员。实际上，大家很快都发现了新的规则，尤其是在新华通讯社公布之前，不应发布任何新闻；而且，大家都必须学习新的政治语言。随着《观察》的易手并在 1950 年 7 月以《新观察》的名字重新付印，储安平最终被吸纳到出版总署。不过，他的这个分配比被动员赴朝鲜做宣传工作的很多同事们还算平顺。

而出版事业的变化则和缓得多了。在 1951 年初，私营出版业仍然盛行，但在国营出版业整顿之后，其改造加速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图书专家们不再坚持自己的要求。一些出版总署的干部毫不犹豫地批评了他们的领导的无责任心，“干得不好”的新华出版社或缺少勇气的出版者。

对于作家而言，很多作了就业的抉择，例如被征召到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沈从文。他们之中一些人无疑仍继续写作和翻译，但很少人能够靠他们的笔杆子生活。至于由国家给予工资来创作的党外作家，他们别无选择，只得服从新的宣传性文学规范。

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战线有利于重建国家，但中共的志愿并不仅限于此。它期待每个人都参与到建设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并完成各自的“革命”，特别是职业社团和小党派的领袖们。当时就算爱国主义和国家发展的远景起到了凝聚力的作用，但中共和党外人们外之间仍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章乃器就反对积极分子进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而来的强硬和冷酷使一些党外人物提出了暴力的问题。这里有张元济、黄炎培和梁漱溟的例子。如果一份 1951 年 3 月的报告是可信的，那么持有与张、黄、梁相同看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由于对于反革命的具体罪行宣传不够，有一部分群众对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措施认识不清楚……也有的教授、民主人士及落后的学生认为杀人是“不仁慈”的事”。作为结果，党强化了其宣传；民众被更积极地卷入镇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也增加了。

到此为止，大学教授们所承受的压力还算比较小。但是在 1951 年，他们的压力增大了。6 月份，所有人被召集去参加“思想斗争”。8 月份，周恩来促使他们“改造自己”，接着在 9 月宣布正式发动思想改造运动。不久，这个运动与“三反”运动混合起来。人们不得不作出自我批评，其中一些人没能过关。比如，张东荪被控叛国，此后仍留在燕京大学（北大很快会迁移至此）、工资照发，但不许再教书了。对于党来说，这是一个手段，用以确保所有人不会反对它的方向 and 选择。因此，思想皈依也许是这场运动中最不重要的目标，其实际效果因而也是最小的。的确，

最重要的一课：使自己适应新政权，适应其规则和要求。他们被迫写下自我批评就彰显了这一点。与受压之下被迫作出的自我批评相比，日记和通信反而更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思想状况。例如，谭其骧在 1951 年冬参与了安徽土改，他注意到大量的紊乱并且对所目睹的不公正的暴力行为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担忧，但他参加“三反”写的最后“汇报”与他在安徽写的笔记完全不相同。在 1952 年 10 月，顾诒刚就认为，当局要求得太多、太快了，因此每个人都被迫说假话。

1949 以后，很快会出现一种职业组织、一个工会、一个文化协会或人民团体，用来代表各个部门、各种职业，代表社会的各部分。这种对社会组织的掌控开创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新形态。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大概会认为某些协会的创设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后来，他们才理解了这些协会并不只是追求现代化的工具而是控制社会的工具，他们开始感到希望幻灭。

无论如何，社会生活没有局限于这些协会。虽然没有了独立的结构，非正式的组织仍然幸存下来或在正式结构之外形成。例如，从 1950-1951 年，一个小组织聚集在罗隆基的周围，而罗与学术圈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较为突出的人物有张东荪、潘光旦和费孝通。此外，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的社会交往形态并未消失。教授，作家，记者在书店、茶社、餐馆聚会以获取信息、交谈或辩论。无疑，其中有些人不得不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但其生活却并未根本改观。这些知识分子们并没有改变其生活方式、或宣布放弃其信仰：友谊、团结、共同的价值观和利害关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其私人的、社交的和知性的生活领域。

不过，由于害怕被挖苦、希望避免被疏远、或希望展示自己乐于适应，其中部分人却是放弃了西装换为党员常穿的蓝色棉布服装，开始阅读马克思、列宁和毛的作品，或决心学习俄语。但这些变化多数都是有时代背景的、相对的。的确，它们证明适应时代要求的必要性而与一个少数派的转变不同——无论后者的转变是机会主义的或是真诚的。另外，在私下里，他们并未错过戏弄这些“时髦术语”的机会，嘲讽那种只有“一脑子八股”者的“空谈”。但事情开始变化，渐渐地，俭朴扎根了，干部们的排斥更加不可忍受了，社会控制也增进了效率。1952 年 2 月，罗隆基身边的圈子成为受攻击的靶子，萧乾则痛惜小出版社的改造，顾诒刚注意到剧院仅仅是服务于政治宣传的工具。这些变化让其中一些人像陈寅恪一样退隐到自己的工作中。

新的资料，特别是私人的资料，揭示这些党外知识分子们迎接新中国最初几年的那份希望和忧惧，揭示了他们所历经的那份幻想和幻灭。他们意识到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性。故而，他们愿意跟新政党合作以建立一个新国家。在那些年里，他们一方面被迫适应，并把它视为一种命运、视为一种为见证自己国家的复苏和获得新生而付出的代价；在另一方面，他们之中多数人也只是抱着游戏心态，并继续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去生活和思考。过渡时期没有所预定的那么长，这跟朝鲜战争有一定的关系。然而，我们不能把新民主主义简单视为一种欺骗性的装饰——即便只是因为它是某个共识的基础——因为假若没有这个共识的话，共产主义者将会遭受更多的困难。